

## 投射于组织中的人性

白 锐\*

Adams, G. B. & Balfour, D. (2004). *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 Armonk: M. E. Sharpe.

艾赅博、百里枫:揭开行政之恶的面具。(中译本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揭开行政之恶的面具》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原因有二:极少有学者像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那样,将现代公共组织的问题挖掘到“邪恶”的深度来进行分析;极少有学者从20世纪的历史悲剧中洞见公共事务理论与实践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如此地强调在公共事务中必须带入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本书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邪恶与特殊意义上的行政之恶的性质。两位作者认为,现代公共生活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包裹着的邪恶,即“行政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邪恶是西方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书将邪恶一般地定义为“不公正或者不必要地施加伤痛、苦难与死亡于其他人的人类行为”(3)。作者认为行政之恶非常典型的情形是,普通大众在自以为正确的事业中,甚至在伟大的动机驱使下,卷入到行政之恶的严重事件当中而不知其所以然。普通人如何可能与大奸大恶扯上关系呢?作者认为,社会关系中,语言与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以及视角与距离,都会让邪恶发生于看似普通的人群。通过语言上的微妙选择,以及各自所处的社会立场不同,加

\* 白锐,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之与受害者距离——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的距离——远近也有差别,时间与地点一旦契合,邪恶就有可能发生。邪恶并非只是个人的事,它更关乎社会,因此作者通过社会建构论的角度,解释了行政之恶更重要的起源:个人的、组织的以及社会的行为的共同建构。

邪恶,具体地说行政之恶是如何转化为一种组织机制的呢?在现代性语境下,是什么样的心理动力使得行政之恶如此地普遍?本书提到两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与米尔格兰实验。这两个实验令人惊异地说明,即使是自以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也会轻易地服从权威;当这种权威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时,情形更加严重。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技术进步,人类展示出越来越大的力量,人们因而忽视了技术理性价值具备超越人类尊严与根本价值的潜在危险;而随着进步与理性价值观出现的人类僭妄心理,使得这样的情形雪上加霜。作者分析,技术理性的危险不单单在于它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还在于过分的技术理性抽空了社会过程中内在的道德感与历史意识。在现代社会,虽然已经有了权利与自由观念的普及,可是服从的社会力量却仍然强大,而对权威的社会服从带来的后果却比从前严重了许多。如果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会服从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合法权威,去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即邪恶的事情),因为人们以为掌握了技术理性的权威会承担责任,于是行政之恶的面具即告应运而生了。作者论断,正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理性传统,催生了行政之恶。

需要检视的第一起历史事件是纳粹大屠杀。作者表明,这起历史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与现代新的技术——理性行政实践(technical-rational administrative practice)相结合。虽然难以接受,可是历史事实确乎表明,理性的行政文化,先进的现代行政结构,甚至现代社会结构,都非常适合于大规模高效率的杀人运动。完善的行政管理运作,包括“公务员队伍的组成与管理,名单编排与档案管理,受害人及其财产的法律地位的界定,犹太人社区的

组织、运输管理、死亡/奴隶劳改营的行政管理,以及所有这些包括其他活动的协调等等(30),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令邪恶成为可能。纳粹大屠杀中理性的公共组织与邪恶的联系如此紧密,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公共组织中的从业者,甚至公共事务的研究者们是否意识到行政之恶的隐蔽性及其巨大潜能。

纳粹德国的理性专业人士中,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精于专业,善于管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与团队运作中都出类拔萃,在第三帝国的战争中,他们功勋卓著,建造了6000多枚V-2火箭;在他们参与的火箭研发项目中,20000多奴工死亡。最具讽刺意义的是,V-2火箭攻击行动中的牺牲者(约5000人)远远不如建造火箭中的死亡奴工多。他们就是冯·布劳恩团队,在著名火箭专家与管理家冯·布劳恩领导下工作的一群德国火箭科学家与工程师。二战结束时,为着对抗苏联的目的,美国政府将冯·布劳恩团队搜罗到本国,让他们为美国的军工技术研发继续效力。这起案例让行政之恶更加扑朔迷离,因为美国政府与军方同样地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法律与道义的约束,摆在第一位的是技术上的考量,是政治上的权益之计。冯·布劳恩团队在美国事业顺利,生活美满。美国政府不单单地对冯·布劳恩团队的过去视而不见,而是对冯·布劳恩团队进行有意的漂白,以达到欺骗公众的目的,编造冯·布劳恩团队逃离德国的故事即是一例。种种策略上的考虑,以及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其实质不过都是面具,用来掩盖行政之恶的面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是行政之恶泛滥的重灾区。作为一个庞大的现代组织,任何一个人要全部掌控NASA运作信息与影响力已经不可能,加上其独特的组织动力作用,NASA逐渐形成一种所谓防卫性的组织文化。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技术上的失误,却可能成为组织管理上的灾难,而这样的事一再发生,无法避免。在“挑战者”号空难后不久,又发生了“哥伦比亚”号灾难。这两起航天空难的原因如果要深究,除了技术失误与组织忽视以外,还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

比如“挑战者”号空难背后的“太空教师”计划就让“挑战者”号的发射在准备并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匆匆进行,其目的是要让里根总统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讲里向大众报告自己同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太空对话。航天灾难中的牺牲与纳粹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自然性质不同,但是航天计划中本可以避免的人员牺牲,因为无意的技术疏忽与有意的组织掩盖而变得不可避免,就现代西方理性组织与文化包裹着行政之恶要素而论,其差异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大。

作者进一步对行政之恶的组织象征(organizational symbolism)进行了深层解读。理性方案之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即是公共政策中作为隐喻的“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 as a metaphor)的内在弊端。作为隐喻的“问题解决”之所以成为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它将社会问题作为标准整齐而单一的物化工程加以解决,而忽视了社会本身是多重价值相互冲突而又平衡的复合体。简单地对社会问题加以一刀切式的解决,这个价值平衡就会被打破,公共政策的根本性价值就会受到威胁。作者反思了从二战后日本裔美国人安置营一直到现代塔斯克吉(Tuskegee)试验<sup>①</sup>的美国历史,认为美国公共政策中这样的威胁一直存在。要在行政之恶的阴影下寻回公共生活的伦理基础,应该如何做呢?作者虽然对于投射于现代组织中的人性不抱乐观的看法,但也谨慎地认为,现代“审议式民主”或可以为防范行政之恶提供一点点虽然脆弱但不失有效的保障。审议式民主作为实体民主的一种实践,将公共政策的伦理判断交给实际面对面进行讨论与决策的公民本身,一方面是让公民获得一个成长的环境与机会,另一方面,这样的实践实质上是公共生活伦理最坚实的基础。一群理

---

<sup>①</sup>指美国公共卫生局从1932年开始的一次医学试验。这次试验长达40年,作为试验对象的近400名染上梅毒的黑人男子被剥夺真实信息,得不到医治,他们被观察的真正目的是测试病毒对人体的实质影响。媒体的报道最终结束了这起事件,1997年克林顿政府正式为此事道歉。

解了社会与政府实质问题的人,一群对公共生活抱着批判态度的人,他们所组成的社群对包括国家在内的社区健康成长至为关键;而他们中的专业人士、公共事务从业人员与研究人員,对于防范行政之恶负有特殊而艰巨的责任。

《揭开行政之恶的面具》面世以来,影响巨大,囊括了多项英语世界公共行政研究的图书奖。本书之所以收获如此美誉,大概是因为学界开始意识到反思公共行政学的重要性。反观对公共事务中种种问题的反思,鲜有公共行政学批判研究将现代公共组织的症结归结到邪恶的深度加以挖掘也鲜有公共行政学批判著作在进行反思时,强调公共组织及其问题的社会建构特征,从而强调公共事务中必须带入历史意识。

行政之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普通人为了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而卷入邪恶之事,且无法意识到其严重性后果——即施加于他人的痛苦甚或导致他人伤亡。而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自启蒙时代以来广为人称道的技术—理性文化之盛行。对于本书的解读可以从多个学科来解读,作者也提到,他们的写作触发点是理查德·L·鲁宾斯坦(Richard L. Rubenstein)1975年出版的《历史的诡异:大屠杀与美国未来》(*The Cunning of History: The Holocaust and the American Future*)。《历史的诡异》本身就是一本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而写的书;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可以从多个层次上来解读,可以从中了解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的程序性症结,也可以思考现代公共组织中根本性的价值问题,读者甚至可以深入地思考投射于公共组织中的人性问题——其学术触角与价值关怀是非常深邃的。

一般说来,行政之恶,甚至邪恶,这样的词出现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可能性不太大。无论是在西方传统还是在中国语境里,邪恶一词包含的是不容置疑的伦理判断,是一般日常谈话都难得涉及的词汇,遑论学术著作。但是对于影响广泛,后果严重的“坏”的公共政策,有哪一个词能比邪恶更贴切呢?将行政之恶作为关键词,是作者挖掘公共政策的历史根源的着力点。本书非常强调公共事务中的

历史意识,认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弱点在于,公共生活中的历史意识被割断。重视历史意识的实质,是表明公共政策应该明确社会环境及其相关问题都是建立在对过去的记忆之上,无论是物质基础、制度结构、意义网络甚至符号象征,都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说到底,行政之恶本质上即是邪恶,是投射于现代公共组织中人性的反映,从根本上说,本书批判的是投射于公共组织中的人性,本书所具备的浓重的历史幽暗意识,是这项研究最为深沉因而最难识别之处。

通常人们会误解作者,以为他们只是强调批判态度对公共生活的重要,以及批判方法对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性;另一个误解是,他们只是关注了美国,或德国(因为德国具备典型的现代理性文化)的技术理性与行政之恶。有人提出北欧的例子加以批评,认为北欧也是现代理性最为完善的地方,而其行政之恶却并不突出。

与一般理性主义与进步主义思想相比,本书固然强调批判的精神与方法,但是作者并没有否认技术进步的正面意义。正如书中已经强调的,作者认可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也尊重理性主义方法在公共事务研究中的独特作用。艾赅博曾经在私下场合论及,他主张的不是哪一种方法更为重要,而是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代替,现代社会的问题是技术理性的方法与原则已经成为公共事务实践与研究中的“主流”心理定势(mindset),人们忽略了反思对于一个学科与实践的重要性,而百里枫除了进行批判研究外,也进行社会政策及公共管理方法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他的教授课程甚至包括统计学(学生曾送他一件T恤,上面写着“统计学之王”)。很明显地,他们主张的是公共行政思想与研究方法中的多元化,而非片面强调某一种方法与哲学在公共行政学中的独大地位。毋宁说,他们是从价值平衡的角度来理解技术理性与社会进步。本书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视角与距离会影响行政之恶的发生。换句话说,要避免行政之恶,就需要从业者与研究者转换自己的视角;“设身处地”地了解实际发生的事例;或者需要他们拉近自己与事件的距离——无论是时间距离

还是空间距离——以便对行政之恶的事件作真切的了解。因此,很难将本书的研究贴上文化中心论的标签。即使从极大地影响了本书写作的鲁宾斯坦的《历史的诡异》一书看,其批评的范围亦是整个西方文化。艾赅博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开始以“南京大屠杀”及日本右翼的教科书事件作为邪恶案例,其公共事务研究的东方视角亦趋显著。北欧的例子并未说明现代理性文化与行政之恶之间失去了联系,相反,作者的洞见更加明显,因为北欧正是靠其政治制度中的社会基层力量有效地化解着可能发生的行政之恶,审议式民主正在起着作用。

正如书中提及,本书的重点并非是为防范行政之恶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作者对自己所提的解决方案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它仅仅是对付大邪大恶的“一条理所当然地细小而脆弱的防波堤”(163)。本书最有力的论述,是对现代组织弊病最深层原因的分析,是对投射于组织中的幽黯人性的深刻洞察。

#### 参考文献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Rubenstein, R. L. (1975). *The Cun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Hatch, M. J. (1997). *Organization Theory: Modern, Symbolic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颜昌武)